# 春沃其华　秋茶其实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

## 从民主革命到十年动乱

1. 地下民促与地下民革的建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 1948 年元旦在香港宣布成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由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天津的秘密活动是从 1946年秋开始的。当时民促中央主席李济深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由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王葆真(1880 年－1977 年)来津负责华北地区的民促工作，主要是团结力量，策划反蒋工作。华北地区先后有张树德、张炳元、曹尔骥、陈迪安、谭松艇等同志参加了民促。是年 10 月 10 日，王葆真召集民促成员和部分反蒋人士约 30 人,在天津国民饭店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名义召开座谈会，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推翻蒋介石独裁暴政，建立民主制度，要求与会同志争取社会反蒋人士，扩大民主力量。此后利用一些成员在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任职的便利,搜集情报,营救中共党员。1948 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地区相继开展工作。王葆真作为民革发起人之一，被推举为中央常委。民革平津地区工作由张树德、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迪安负责,成员达到 20 人，他们与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为解放天津作出了积极贡献。

地下民促与地下民革的建立，为民革筹备机构的成立作了组织准备。1951 年 2 月民革天津市分部筹备委员会成立,杨亦周、郝伯时、赵光庭、凌勉之、张树德、王履和、范绍韩、廉士聪为筹备委员,杨亦周为召集人。此后民革中央加派娄凝先、宋景毅、宋罗岐、孙湘为筹备委员。到 1951 年年底,民革成员总数达到 81 人。

2. 投身“五大”运动

50 年代初期，市民革号召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积极投身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五大运动中去接受锻炼和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民革成员参加了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活动和捐献飞机大炮的义举。民革天津市筹委会召集人杨亦周以筹委会发言人等名义在《天津日报》、《进步日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美帝国主义单独对日媾和、拥护和平理事会宣言、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等。筹委会还派郝伯时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在土改运动中,筹委会派出杨亦周、范绍韩、王崇禹、王述文、贾桂林、哈今等人参加土改，并视察了土改工作。他们听取土改报告，深入农村调查,参加斗争大会,举行贫雇农座谈会,学习土改经验,了解土改工作的真实情况；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筹委会举行座谈会，向每位成员发放《镇反手册》,并订立爱国公约,将积极参加“镇反”运动作为其中的重要任务，协助市政府做好各类案件的处理工作。1951 年 11 月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 年 1 月又开始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按照民革总部有关坦白、检举的部署，天津民革筹委会积极开展工作。

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民革组织和全体成员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政治觉悟，明确了

前进方向，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3. 第一次民革成员大会和议政参政

1953年7月26日民革天津市分部筹委会召开第一次成员大会。8月1日召开了民革天津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亦周、宋罗岐、孙湘、于松如、范绍韩、赵光庭、凌勉之为常委委员，选举杨亦周为主任委员，会议决定市委会下设组织组、宣传组、秘书组。到年底，成员为286人，平均年龄36.5岁，93%是行政机关干部。

五六十年代，市民革的议政参政主要是通过参加政协组织的讨论协商活动以及在政府部门中的任职来实现的。他们积极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座谈会、学习会、协商会等活动，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献计献策。

50年代后期，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有些民革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了60年代，在统战工作中开展了对所谓“投降主义”的批判，民革市委会的工作一度处于低潮。

4. 民革的整风运动

1957年4月中共决定在全党整风。按照民革中央的要求，根据形势的发展，市民革首先开展了以反右派斗争为主的整风运动。到1958年3月又开展了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为主的一般整风运动，运动的重点是“向党交心”，即“交对共产党的认识，交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交大鸣大放期间的言行和思想活动；交个人所受右派分子的言行影响，交反右派斗争后的思想认识。”

从1958年3月18日至4月2日，市民革和南开区民革、红桥区民革的成员，共交出心里话和“一闪念”2.8万余条，个人最多的交了600多条。这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给民革成员造成了心理压力，搞人人过关，迫使大家说了许多违心的话，严重违背了当时的思想实际。运动又进一步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以致在交心过程中有“错误思想”的一部分成员被定为“右派分子”，造成更多的不幸。

5. 加强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

“文革”前的民革章程把民革确定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就要加强对成员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为此，市民革组织和推动全体成员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加深理解民革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任务和作用；研究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科学的发展，以进一步加强对于新民主主义和统战任务的认识。”天津民革还转发了民革中央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学习提纲》,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为基本学习文件，着重搞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等问题。根据中共在建国初期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要求，市民革及时组织成员及所联系的社会人士认真学习中共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认清形势,紧跟时代步伐,在各种运动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树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1953 年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了学习领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提高全体成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市民革多次召开会议，要求成员们密切结合思想实际，掌握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深入地学习,正确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和意义，使每个成员都在思想上提高一步；同时结合民革在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负担的任务，进一步发挥民革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强工作效能，为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6. 贯彻‘二大’精神,积极参加建设

1958 年 11 月 2 日民革天津市会举行了第二次成员大会。会议选举杨亦周为主任委员，于松如、范绍韩为副主任委员，马际融为秘书长。会议要求广大成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国共

产党的总路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62 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自我改造问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对此，市民革专门组织了传达和讨论，民革广大成员深受鼓舞。大家说周总理既然为我们“摘帽加冕”（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桂冠），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于松如、高维荣、孙履厚等一批成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他们发明的蒸汽喷射冷冻机、高速浆纱机、连续聚合法等被认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于松如是中纺天津分公司一厂的工程师，后任市纺织局副总工程师。解放初期，面对旧中国留下来的机器设备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技术封锁，他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投入到恢复生产的建设中。他设计改装的动力锅炉，创全市同类型锅炉最低煤耗纪录。1954 年鞍山钢铁公司的一台气轮机需要修理，许多工程师和苏联专家都无济于事，于松如以高超的技术把机器修复了，苏联专家深表钦佩，当场将手表相赠以为纪念。50 年代末，他在 K 式锅炉上加水冷壁和外彻炉膛，提高了锅炉功效，这项技术曾先后在全市企业和全国纺织企业推广。他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他去世前，仍在研究煤或石油的掺水燃烧，取得了节省能源的效果。

高维荣是市纺织局高级工程师，1956 年以后多次被评为全国和全市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1978 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获‘全国有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解放初期，他为改变纺织厂夏季高温生产的困难，创造了“人造地下沙层打井法”，使低温地下水出水量成倍增长，解决了空调系统的冷源难题。此后，他和同志们设计制造了清花滤尘机、八色印花机、化纤织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温定型机、热溶染色机等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65 年《人民日报》报道了高维荣的事迹,并配发了《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的评论员文章,对高维荣给予很高的评价。直到晚年,他还一直为促进天津和台湾纺织界的技术交流而努力。

孙履厚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专家。五六十年代曾担任工业试验所副所长、有机合成研究所所长等职。1978年在担任化工局副总工程师期间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他特别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曾组织完成了 8 项科研课题,其中有 5 项分别获得全国和市科学大会、轻工业部以及市科技成果奖；有 7 项在天津得到推广应用。他研究设计的本市第一套小型石油化工联合装置，在石化实验厂投入生产，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将环氧丙烷和顺酐的中试成果分别无偿提供给大沽化工厂和石化二厂，帮助他们实现了工业生产。他组织完成了 7 项调研课题,分别获得了中国石化公司和市情报成果奖或科技进步奖，有 2 项在天津得到生产应用。此外他还编写了 3 本著作，受到同仁赞誉。

7. 神仙会“三大”“社教”运动

为了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消除各民主党派成员中由“反右”等运动带来的紧张、疑虑情绪,以李维汉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提议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讨论各民主党派成员中的思想认识问题。

1960 年 10 月 3 日市民革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民革中央四届二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进行,“通过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方法，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并且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鼓励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有争有辩,有敞有议。会议气氛和谐、热烈,做到了“有争论,无压力”,与会人员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思想有所进步。此后民革组织中广泛开展的自我教育活动，为团结和动员广大成员顺利度过 3 年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 3 年困难时期,民革成员坚决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经受了考验。这一时期，市民革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成员学习，进行形势教育，使广大成员坚定了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战胜困难的信心 另一方面,各级组织发动成员和所联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兴办街道工厂,从事副业生产,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以各种方式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发动民革成员撰写文史资料，是民革市委会在经济困难时期开展的又一项重要活动。据统计，到 1964 年市民革成员共撰写文史资料百万余字。这项工作不仅为许多成员提供了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的机会，也对作者本人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为研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63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5 日民革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杨亦周当选主任委员,于松如、凌勉之当选副主任委员，马际融当选秘书长。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贯彻民革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展以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此,市民革号召全体成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改造立场和世界观，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三个主义”教育运动中，市民革制定了以“三挖、一扎、两促进”为主要内容的规划,即 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根子 扎无产阶级的根子,促进政治思想和服务的革命化。同时实行了“三大”,即 大讲阶级斗争形势,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大议阶级斗争问题。对此,于松如在 1979 年底召开的民革天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民革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

缺点和问题,特别是 1963 年到 1966 年那一阶段,往往对成员的要求，未作认真地分析和及时反映，只强调代表成员的根本利益——改造 对成员的思想改造,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间，尽管受‘左’的思想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状态,但市民革仍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造和服务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民革各级组织一方面推动成员和所联系人士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开展思想教育，加强世界观和旧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另一方面鼓励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积极投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做好本职工作，参加劳动锻炼，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正是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使民革成员和所联系人士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很大提高，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1966年 8月 8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革’的全面爆发。从 8 月 25 日开始,200 多名津京红卫兵冲击市民革机关，揪斗部分负责人，勒令停止办公，解散组织。民革机关干部被迫贴出大字报，接受红卫兵意见，从即日起民革市委会停止活动。

## 从恢复组织活动到发挥参政党作用

1. 转移工作重点与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

1977 年 12 月民革中央恢复活动，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1978 年 1月民革天津市委会成立了以于松如、凌勉之、马际融、王久、刘瑞明、孙履厚、张省三和廉士聪为领导成员的临时领导小组，逐步恢复组织活动。同年 3 月增补黄逖非为领导小组成员。此时有民

革成员 354 人,比‘文革’开始前减少了 121 人。

1978 年 12 月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 1979 年 6 月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关于各民主党派性质的论述，民革组织及其成员的思想得到大解放,逐步摆脱了‘左’的束缚,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广大民革成员认识趋于统一，精神振奋，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光荣感和责任感进一步得到增强。市民革恢复组织活动后，组织党员和所联系人士开展学习谈心活动，疏导思想情绪，进行思想建设。同时，协助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使被错误处理的民革成员得到了平反昭雪，被错划为右派的得到了改正；在此基础上举行思想汇报会、工作经验交流会，表彰民革成员的先进事迹，推动成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开展对台宣传和编写文史资料。

1979 年 12 月民革天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距上一次代表大会 16 年之后隆重举行。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第二书记黄志刚，市委书记阎达开会见了与会代表，黄志刚作重要讲话。代表们欢聚一堂，共议民革大计，场面十分热烈。大会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准则，根据新时期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结合民革的特点，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祖国统一服务上来，并号召党员为之努力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委员会，黄逖非为主任委员，于松如、凌勉之、张学铭、王久、马际融为副主任委员,刘瑞明为秘书长。

1984 年 3 月民革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委员会,黄逖非为主任委员,凌勉之、马际融、刘瑞明、高维荣、孙履厚、孙志强、许功锐为副主任委员,李贻亮为秘书长。在市民革五届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增选陈培烈为副主任委员。从这次代表大会开始实行新老交替、新老合作,在 48 位委员、候补委员中有 23 位

新人,另有 15 位老同志担任了本届委员会顾问。

1988 年 3 月民革天津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迄今唯一一次采取差额选举市委会委员、候补委员的大会。在六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推举黄逖非为名誉主任委员，高维荣为名誉副主任委员 选举陈培烈为主任委员,刘瑞明、孙履厚、孙志强、许功锐为副主任委员,李贻亮为秘书长 推举 16 位老同志担任本届委员会顾问。在民革市委会六届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增选杨大峥、缪主恩为副主任委员。

按照民革中央的部署，民革天津市第四、五、六届委员会都是把“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作为工作方针的，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

2.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近 20年民革市委会工作重点，特别是进入 80年代,市民革认真贯彻‘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开展了咨询服务、智力支边扶贫、兴办学校等项工作。同时号召广大党员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为了加强对四化服务工作的领导，1981 年 5 月市民革建立了四化服务工作委员会。

1987 年 2 月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津沽咨询服务部成立，属四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是民革市委会面向社会服务的部门之一，主任孙履厚(兼)。原有的津沽翻译服务社、津沽书画社、会计服务社、工程技术咨询服务社均由咨询部负责管理。与此同时，民革南开区支部建立了企业财务咨询服务部；民革河北区支部成立了为四化服务小组；民革塘沽区支部建立了津沽咨询服务部塘沽分部。

津沽翻译服务社成立于 1984 年 6 月,由民革党员中部分精通外语的人士组成,孙履厚、齐树敬、管煜成先后任社长,该社与重点工程指挥部、精细石油化工情报中心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翻译

英、日、法、俄、西、韩、荷等外文资料达 3 亿多字。1985 年该社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表彰大会上获先进集体称号。

根据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市民革响应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号召,于 1983 年开展了智力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工作。同年 5 月首次组成智力支边工作组,由刘瑞明领队赴包头,针对包头棉纺、印染、针织等 5 家企业提出的问题,围绕车间空调、印染工艺、老厂改造等 16 个课题提出建议 89 条。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色吉拉胡给予高度评价:“所提建议设计合理、切实可行。”经落实之后,已经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市民革于 1985 年 9 月第二次派出由孙履厚领队赴包头智力支边小组。他们对包头炼油厂的三废治理、工艺改革、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20 多项,使该厂在 1986 年盈利 10 万元。1986 年 10 月由市民革副秘书长何不洁领队的智力支边小组应邀到贵州威宁回族自治县毛制品厂进行咨询服务。为该厂进行理论培训、实际操作示范,并提出建议 10项,解决了纯毛染色问题,使该厂产值翻了一番,利税增加 3 倍。1987 年 11 月市民革第三次派出智力支边小组赴包头市毛毡厂进行咨询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30 余项,彻底改变了该厂一等原料、二等产品、三等价钱的问题,使该厂产品质量达到部颁标准。该厂采纳支边小组的意见后,每月增收节支达 5 万元,该厂因此提出了与民革天津市委会咨询服务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建议。1988 年 6 月由何丕洁领队赴已亏损 79 万元的贵州省毕节地区毛纺厂进行咨询服务。他们就该厂的工艺操作、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该厂领导感激地说:“经过你们的技术咨询,使我厂产值、利润大幅度增加,其产品亦由滞销变为畅销。”1990 年 5 月何丕洁获贵州省智力支边咨询服务特邀个人荣誉证书。1990年 11 月贵州省智力支边联系小组代表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专程来津表示感谢。

市民革组织及其成员对内蒙、贵州等贫困地区智力扶贫成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显著，1993 年市民革四化处（现经社处）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评为全国支边扶贫先进集体。天津市各级民革组织及民革成员张雪岩、张国基等广大党员也多次向贫困地区、受灾地区、希望工程捐款 50 万元，捐衣物 3000 余件。民革成员夏伟还在蓟县贫困山区捐资兴建了 2 座希望小学。

津沽诗画研究会成立于 1981 年 7 月，该会是由民革党员和联系人士中有诗词书画专长的人员组成的松散型组织。1982 年以来该组织先后举办了 10 余次大型书画展。

1992 年民革市委会组建了中山审计事务所，市民革副主委、注册会计师孙胜民任所长。8 年来，该所积极开展验资、查证、咨询、评估等业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民革市委会从 1982 年开始办学，在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帮助下，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遵循‘积极量力、拾遗补缺、发挥优势、注重实效’的办学方针，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式，相继创办市属中山学校 1 所，区属中山学校 7 所，联办学校 4 所。1985 年 7 月经市二教局批准，民革中山学校组建了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民革津沽工作站，后改名为天津电大中山工作站，先后办起了汉语言文学、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英语等专业的电大辅导班。中山学校校长先后由严六符、薛新翔、王明哲、吴德风担任。1989 年 9 月薛新翔获天津市政府授予的优秀工作者称号。1990 年 3 月在天津市二教局举行的社会力量办学评估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山学校被评为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1990 年 10 月在全国民革办学工作会议上，中山学校被评为先进集体，薛新翔被评为先进个人。1993 年、1995 年民革中山学校连续两次被评为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1995 年吴德风被评为天津市先进教师。该校从创办至 1999 年底累计培养各类结业生 5 万余人。10 多年来，在市民革和市教委的领导、关心、支持下，中山学校不断健康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97 年以来，该校受市民革委托，为

100 余位下岗职工免费举办了老年护理班、烹饪班，效果明显，受到有关部门好评。

市民革分别于 1983 年、1984 年、1990 年召开民革党员和基层组织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服务经验交流表彰大会，2000 年召开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先后有 40 余个(次)基层组织和近 400 人次的党员受到表彰。其中有自 1977 年至 1986 年坚持义务教学，培养 200 余名学生的栗云龙从 1980 年开始撰写多篇论文，提出颇有价值的建议，连续 6 年被金融学会评为先进集体的金融研究组；1991 年起任天津新型建材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荣获市“八五”立功奖章、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的陆锡蕾多年来在教学领域辛勤耕耘、获得天津市教学楷模的天津师大的王怀玉、崔照芳。在 2000 年 11 月召开的民革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总结表彰大会上，杨大峥、雷世钧、陆锡蕾、刘瑞明、孙履厚、胡龙桥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3. 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搞好队伍建设是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基础。1980 年民革市委会成立了“对台宣传工作委员会”，后改为“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先后由市民革副主委马际融、许功锐、郑祖珂兼主任。1984 年设立办公室，简称“祖统办”。1986 年在民革市委会所属的 30 个基层支部中，设立了分管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支部委员，至此市民革系统由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基层支部组成的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三级网络已经基本形成。

在开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工作中，市民革曾举办了 7 次由工作骨干和台属参加的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 540 余人次，深入学习了中共对台工作方针政策。同时还开展了香港基本法知识竞赛、涉台教育知识竞赛、澳门基本法知识竞赛等活动。另外，市民革经常召开祖统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听取意见，反映要求举行对台工作研讨会，召开基层支部祖统工作座谈会；对在祖统工作中

成绩突出的南开、塘沽等区支部给予表彰。

开展对台宣传是市民革的一个优势。1982年市民革与市委对台办合作出版了《津门忆旧》一书,约 90万字。1984年市民革成立了‘台湾情况研究组”,撰写涉台论文 40余篇,在报刊、杂志发表对台宣传稿件百余篇。根据对台宣传工作的需要,市民革从 1984年开始,编辑内部参考资料《台情资料》24期;邀请中共天津市委对台办、市国家安全局、南开大学台湾研究所等单位负责人作台情报告 27次。民革市委会先后 8次被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对台工作办公室评为对台宣传先进集体;民革党员刘炎臣等 12人被评为对台宣传先进个人。

从 1997年 12月开始编辑《台情要闻》,供民革市委会领导和有关同志参阅。同年,市民革与天津社科院联合举办了香港回归与两岸和平统一研讨会,共征集论文 19篇,其中民革市委会组织论文 7篇,均在有关刊物发表。

推进涉台参政议政,拓展祖统工作新领域。市民革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海峡两岸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开展涉台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 52篇调研报告,内容涉及加强对台湾和海外的宣传、保护台商合法权益、做好台胞接待、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等方面。1994年市民革与民革中央、福建、深圳民革开展了大规模调研活动,完成了“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几点建议”的调研报告,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盛霖的重视,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

1987年 10月台湾当局宣布有条件地允许台胞回大陆探亲。对此,民革中央对接待台胞来大陆探亲作出相应决定。民革市委会于 1987年 10月举行五届十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的接待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做好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观光的接待工作的决议》。1988年以来,市民革通过有‘三胞’关系的党员,利用各种途径,加强对台湾工商企业

界、文化界人士和年轻一代的宣传工作。12 年间市委会领导和广大党员共接待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5000 人次,其中既有在海内外政治上有影响的人士，也有在专业领域有造诣、有建树的人士，如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博士，美国共和党亚裔总部党主席陈本昌博士等。通过交往,增进了共识,推动了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改革开放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有 3000 人次的民革党员赴台、港、澳地区和美、日、英、法、俄等国家从事文化、体育和经贸交流及探亲访友，促进了交流交往。如鲍元恺 7 次赴台讲学,促成大型管弦乐《炎黄风情》在北京、台北同时演出，在台湾产生轰动。

为‘三引进’,牵线搭桥,取得成效。截至 1990 年底,经过民革党员牵线搭桥，台商、外商在大陆投资设厂以及意向投资总额达 1024 万美元，其中，王琦通过在台亲属为天津市卷帘厂引进台资 155 万美元 秦至臻引进港资 35 万美元在宁夏中卫县成立了卫港鞋业有限公司；曾春和引进加拿大资金 30 万美元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电子公司；彭栋引进港资 4 万美元与山东滕州鲁南衡器厂合资创办了金属软管厂。1989 年 9 月民革党员郑楠桂与巴西华裔友人、中巴文化教育友好协会会长戚连彪联系，促成了世界足坛劲旅巴西桑托斯足球队访华 7 场比赛。这是在这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来华访问的第一支有影响的球队，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图谋，而且使巴西来宾目睹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平稳局势。截至 2000 年 6 月底，由民革市委会成员引进资金共 5 亿余美元。如引进近 1 亿美元的台资，促成台湾声宝集团与天津合作，成立了天津新宝天洋家电有限公司和新宝电器企业集团；引进台资成立了天津华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引进港资在保税区建起崇明大楼，在武清高科技园区建起力生工业园等。

4. 发挥群体智慧，开展调查研究

市民革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调查研究，参政议政。1988 年 10 月民革市委会向党员发出了“发挥群体智慧，积极参政议政”的号召，使调查研究，参政议政这项由党员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少数人参加的活动，变成了由民革组织，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有广大党员参与的重要工作。这与 1994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民主党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建立参政党五种机制之一的“发挥参政议政群体优势的机制”相契合。市民革根据党员的特长，成立了体育、财税、金融等专题调研组，围绕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党员和社会联系人士开展调查研究。

由天津师大体育教研室王怀玉教授等体育界民革党员组成的体育专题调研组，就本市体育运动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和体育后备人才匮乏等问题展开调研，提交了“对天津市体育现状的剖析与建议”的调研报告，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杨竞衡等有关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调研成果，并采纳了有关建议。在治理整顿中，财税专题调研组针对农贸摊群市场管理机制不完善、重收轻管、偷税漏税等问题，深入财政、工商、税务、公安和个体劳协等部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提交了“关于治理整顿农贸摊群市场的几点建议”的报告，受到各有关部门的普遍重视。“三角债”问题已成为某些企业的沉重包袱。金融专题调研组围绕彻底清理“三角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彻底清理‘三角债’的几点建议”，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杨竞衡和时任副市长张立昌的赞许。此后，市民革又完成了“关于严肃结算纪律，进一步清理三角债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后，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使天津市与外埠偿付清欠款项和天津市同城清欠进展顺利，成绩显著。清欠总金额 62.6 亿元，其中与外埠清欠款项 6149 笔，清欠金额 6.9 亿元。在国家注入 4 亿元资金的有力启动下，天津市同城连环清欠金额 55.7 亿元，使全市上千家企业从沉重的债务锁链中解脱出来。

1990 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以后，中共天津市委认真贯彻执行《意见》,多党合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市民革自身也进一步明确了作为参政党的性质和任务，大大提高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民革市委会将调研组改为经济、科技、祖国统一等专业委员会，市民革领导分别兼任各专委会主任，民革市委会委员和有专长的党员担任了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并且制定了《专业委员会工作通则》。市民革领导亲自参与调研并撰写、修改调研报告。同时在调研中注意与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紧密配合，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参与调研,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到 1991 年底，民革市委会完成调研报告 18篇,均获重视和好评,并得到市领导的肯定与鼓励,或被政府采纳，或作为制定政策时的参考。

实践证明，市民革发挥群体智慧，开展调查研究，使之成为参政议政的基础，而且也使参政议政工作进一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

5. 贯彻“七大”精神,发挥参政党职能

1992 年 6月举行了民革天津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精神，提出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民革工作的指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民革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多作贡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委员会，陈培烈为主任委员，杨大峥、刘瑞明、孙履厚、许功锐、缪主恩、郑祖珂为副主任委员,孙胜民为秘书长。

1993 年天津民革与北京民革就金融领域问题联合调研，分别完成了“关于京津金融大联合有关建议的意见”“关于组建渤海地区发展银行的建议”的调研报告。开展民革省级组织之间的横向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